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对外观之比较

李 少 军

作者 李少军,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魏源 冯桂芬 横井小楠 对外观

提要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分别是中日近代先驱思想家。他们的对外观反映了对时代的适应程度。通过比较可看出其明显的差异: (1) 对于当时世界逐步形成整体的趋势, 魏、冯的认识不及横井明晰、深刻, 他们对西方国家先进性的看法也有差别; (2) 在对外观念上, 魏、冯未改变华夷观念, 而横井完全摒弃了这种观念; 对于闭关政策的认识与批判, 魏、冯尚不及横井深入和全面; 进而在形成主动面向世界求发展的观念意识上, 魏、冯与横井相比, 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魏源与冯桂芬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驱思想家; 横井小楠 (1809- 1868) 则是日本德川幕府被迫对外开放门户后最为卓越的开国论者。他们都活跃于 19 世纪中期, 面对着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顺应世界潮流、御侮图强的共同课题, 分别提出了在当时条件下最为进步的思想主张, 以此取得了各自的历史地位。而当我们把魏、冯与横井主张进行比较时, 又会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这里, 仅就他们的对外观——最能体现其对时代的适应程度的部分, 进行比较。

一、对世界的认识

魏、冯与横井所亲身经历的中日历史大转折的直接促动因素是两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巨大变化。因此, 他们都致力于打破两国长期的闭塞状态, 如饥似渴地搜集和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 以弄清剧变之由来。在这方面, 魏源走在前面。他在鸦片战争后发愤编纂《海国图志》一书, 对包括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在内的中日志士仁人了解和认识世界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但是, 中日两国对世界的认识 (这里主要指有关世界基本形势和对西方国家的认识), 很快就发生了明显的差异, 这在魏、冯与横井之间突出地反映了出来。

关于当时世界的基本形势, 即地球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对孤立分散状态, 已因海道大通和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而基本改变, 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的趋势, 魏、冯与横井是怎样看的呢?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 尽其所能地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与政教人情, 同时对沟通远近各国的新式交通工具也很重视。不过, 他对 19 世纪中期的世界基本形势, 却很少谈论。有论者指出: 《海国图志》咸丰二年增补版卷 5《东南洋各国叙》中有“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 沧海之运随地圆体, 其自西而东乎”、“岂

“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等语，可见魏源已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②。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魏源的上述认识毕竟还是十分朦胧的，带有神秘色彩。所谓“中外一家”，比较含浑，尤其是对世界基本形势变化的深刻意义，魏源尚未充分认识。冯桂芬在1861年编成的《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写道：“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③。他在魏源所云“天地之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舟车、人力在全球逐渐联为一体过程中的作用，但还是很粗略。至于世界形成一体的深刻意义，他与魏源一样，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横井小楠对世界形势的观察，主要始于1853年美舰来日之后。1855年，他读到《海国图志》，大大推进了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之后，他的认识又很快超越了魏、冯。与冯桂芬撰写《采西学议》差不多同时，横井写出了他的名篇《国是三论》，其中指出：“外国之形势大变，航海之术广为发展，大洋中通航，便捷胜于平陆，火轮船发明以来，千万里亦如毗邻。地球上除冰海之外，无可不至之处。”如果说这些文字，与魏、冯的认识难分伯仲的话，那么，以下的论述便显示出横井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当今航海大开，成不可拒纳海外诸国之时势”；“天地之气运与万国之形势，非一己之好恶所能改变之事，……乘天地之气运，顺应万国之状况，以公共之道经纶天下，则万方无碍”；“有纵论万国之能力，始可治日本”^④。显然，横井不仅看到了世界基本形势的变化，而且明确认识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即闭关锁国、拒纳海外诸国已为时代潮流所不容。在此局面下，只有主动面向世界，日本才会有前途。

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是魏、冯与横井对世界认识的重要内容。在此问题上，他们都看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性及其在武力与科技上的先进性。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既是必须戒备和抵抗的对象，又是应该学习的对象。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出现在他们所肯定的西方国家的先进性的一些内容上。

众所周知，魏源所明确肯定的西方国家的先进性，是它们的船炮、养兵练兵之法和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他认为，只要像俄国彼得大帝那样，善于学习西方技艺、器械，就会很快转弱为强。当然，他也关注西方国家的政教，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与国会制、瑞士的“不立王侯”都很有好感，但他没有肯定这些是应该学习的先进东西。他在晚年撰写的带总结性的著作《默觚》中写道：“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天包地外，月受日光”^⑤。可见，中国当时的政治伦理，在魏源看来仍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不可能认为美国、瑞士的政治制度在整体上比中国优越。

冯桂芬对西方国家先进性的看法，较魏源有所发展，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⑥。他所肯定的西方国家的先进性，已超出了军事、技术范围，而扩展到经济（“地无遗利”）、政治（“君民不隔”）、教育和用人制度（“人无弃材”）、社会风气（“名实必符”）方面。但是，问题在于，冯的上述认识，还相当粗略和笼统，缺乏具体的说明。他在《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中主张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是“富强之术”，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历法、农业和纺织机械及“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基本上还是科学技术。至于政治方面，冯桂芬尽管已经感受到西方国家有其长处，但却明确将此方面排除在学习的范围之外。他的《公黜陟议》，原稿上本有介绍美国总统选举制“传贤不传子”，并说美国“国以富强”的内容，但定稿时却删去了^⑦；而公之于世的《采西学议》，则明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还是肯定中国的政治伦理不可动摇。

横井小楠对西方国家先进性的肯定，比魏、冯都要广泛。尽管他与魏、冯一样，不曾亲赴西方国家，也不识西文，无法直接阅读西书，但观察西方国家却尽量做到了解其“政法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他认为应该取法华盛顿，“取智识于万国，裨益政教”^⑧。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性。军事方面前已触及，兹不赘述。政治方面，他不仅与魏、冯一样对美国的总统民选制深表好感，而且还将目光进一步延伸到英、俄等国的政治制度，赞赏“英吉利政体一概本于民情，官之所行，事无大小均必与民意；其所使者从，所不悦者不加强制，出兵言和亦然。是以与俄战，与清战兵革数年，死伤无数，所费不貲，皆取诸民，而无一怨嗟者”；“俄罗斯等国，……政教悉本诸伦理，而莫不急于为生民者”^⑨。他对当时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了解，当然还是很幼稚、肤浅的，甚至还因误解而过于美化，但考虑他所受的局限，这些不足为怪。难得的是，横井作为儒学者，明确肯定他所了解的西方政治制度符合“三代治

教”；还无所顾忌地将其与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相比较，大胆地赞同美国海军提督培理关于日本“无政事”的批评，明言“诚然如此”^⑥。这表明横井毫不含糊地承认了当时西方政治制度较之于日本的先进性，是应该取法的对象。这一点，与魏、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经济方面，横井充分肯定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先进性。他在《沼山对话》中谈道：“西洋之前代，总体可视为以商贾立国。近来又发明众多经世济民之道，……达到如是之富强”^⑦。他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领先，除了侵略掠夺弱小国家民族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它们“对民生日用者如火轮船、蒸汽机、传信机、水力纺织机等，皆讲究制造而至其极”，同时“与万国交通，以扩充交易之利”^⑧。西方国家讲究制造、与万国交通以发展经济的做法，又被他肯定为“经纶之功业”，“可谓得圣人作用”^⑨。他还将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与日本在锁国条件下生产停滞、流通壅塞、游手无业者多、举国贫弱的状况相比较，以凸现出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先进性。应该注意的是，横井特别痛感到日本当时在通商交易方面能力远不及西方国家。他曾指出：“外国之交易，有商法之学，研讨世界产物之有无，究明物价之高下，与万国广为通商，又结商社以互为影响，以如此之熟练对我拙劣之人，几如大人之对小儿”^⑩。与横井相比较，魏、冯对西方广为运用机器与科技而臻于富强的现实固然也有认识，冯还主张“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他们都没有像横井这样将西方发展经济的做法赞为“圣人作用”，进而据以批判和否定本国现有的经济运作方式。尤其在“与万国交通，以扩充交易之利”这一点上，魏、冯更未像横井那样引起高度重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了英国对海外贸易的高度依赖性，注意到其“专行贾”与“雄岛夷”之间的联系，但却并不欣赏“专行贾”；相反，对他眼中“物产丰盈”、“不必远涉万里而谋生”，不“专于争利”的法国，他的好感更多^⑪。冯桂芬在其著作中，谈论西方国家科技发展、盛行机器生产之处不少，但对它们善于从事国际贸易及由此所产生的效果，却极少言及。魏、冯均未如同横井那样，把本国在海外通商贸易上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视为严重问题。冯在他认为应该借用的各国富强之术，并没有列举这一项。

二、对外观念

这里所说的对外观念，包括对本国国际地位的看法和本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看法。在这方面，魏、冯与横井思想上的差异也很明显。

首先，关于本国国际地位。魏、冯与横井都是爱国者，面对本国对外关系的逆转，他们都十分关注本国的国际地位，也都有一个转变传统的华夷观念的问题。

视本国为天下中心，对别国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是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中非常普遍的观念，鸦片战争前的魏、冯也不例外。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订立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种现实，对魏、冯是极大的刺激。魏源疾呼：“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排”^⑫；冯桂芬悲愤地写道：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⑬。他们都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严重受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重新审视传统的华夷观念。

魏源的华夷观念，终生不曾改变。他在鸦片战争后编纂的两部发愤之作《圣武记》与《海国图志》，前者旨在发扬清朝文治武功，以恢复“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四夷来王”的局面^⑭；后者目的在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⑮。这两部书的反侵略精神是无可置疑的，但又都将西方国家放在“夷”的位置上，不认为它们与中国对等。魏源晚年所著《默觚》，依然认为华夷之间的上下关系不可改变，写道：“四夷非中国莫统”^⑯。冯桂芬与魏源也并无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是“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五洲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他主张借鉴西方的“富强之术”，最终目的在于“雄长瀛寰，……复本有之强，……雪从前之耻，……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⑰。

面对剧变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沦落，魏、冯所憧憬的是恢复以往的旧观，而未自觉地把改变华

夷观念，代之以国家之间对等的观念作为课题。

至于横井小楠，直到 1855 年之前，因受传统儒学和日本水户学的影响，加上不太明了海外状况，他对于日本的国际地位持有不合实际的想法，认为：“我神州百王一代，三千年来独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万国无可比拟”^⑧，而西方各国，不过是“丑虏”而已。在 1855 年读到《海国图志》之后，他的观念迅速起了变化。如前所述，他从多方面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痛感到日本的落后，从而消除了自视优越的观念。这不仅体现在“夷虏”之类的称呼逐渐从他的文字中消失（如《国是三论》，论及西方国家，已不称“夷”），更体现在他明确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先进性与中日两国的落后性作对比，指出：“支那与我国终成愚国，大劣于西洋”^⑨。对于他本人也曾信奉的华夷观念，也毫不含糊地作了尖锐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主要是以当时的清朝为对象展开的。他在《国是三论》中写道：清朝“自称中国华域，视外国为蛮夷”，至道光、咸丰年间，“其敝流于骄傲文弱，不知海外各国多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非如诸夏之亡者，而以昔日之夷狄待之，视同禽兽而轻藐之”，由此导致鸦片战争之败，但却依然“骄惰侮慢”，加之其他原因，又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大败，“国体陨坠如斯”。在这里，横井强调指出了华夷观念不仅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而且还会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他力言：“宜以支那为鉴。”^⑩此外，横井还对华夷的概念重作解释，在 1857 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道之所在处，虽外夷亦为中国；若变为无道，则我国、支那亦为夷，初无所谓中国、夷之分。”^⑪这就是说，他认为所谓华夷是与道之存否相联系的，并不限于特定的国家。与魏、冯固守中国为华、外国为夷的观念相比，横井显然完全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其次，关于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在中日被迫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之后，怎样看待本国对外关系，是否继续维持闭关锁国观念，是两国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魏、冯与横井对此问题，也各有其回答。

中国当时的对外关系，除了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之外，主要是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宗藩关系，魏、冯是主张要继续维护的，因为他们并未改变华夷观念。而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主要出于对英国等国侵华的愤慨，而强调对抗、利用或驾驭。这一点，从魏源明言编纂《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⑫；从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所言“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⑬，就可看得很清楚。对魏、冯的上述主张，有关论者多强调其反抗侵略和重视对外关系的积极意义而予以肯定，而对魏、冯是否还认识到必须与西方国家展开正常交往的问题，则未加以深入探讨。现在看来，魏、冯尚未明确提出必须与西方国家展开正常交往的主张，而主要是感到制服、驾驭外夷的难度空前增大。因此，他们对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没有提出多少具体意见，而着重于探求在新情势下如何“制夷”和“驭夷”，魏源之“师夷长技”，冯桂芬之“采西学”、“制洋器”，落脚点都是“攘夷”。正如冯所说：“用之乃所以攘之也”^⑭。

与此相对应的是魏、冯对闭关自守政策的批判。魏、冯反对闭关自守，在史学界已成定论，根据是他们主张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我认为：开眼看世界和学习西方，与反对闭关自守似不能完全等同。魏源对闭关自守政策确有批判，但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抨击闭关自守所导致的不明外情和不能取得外国先进武器与技艺方面，不满统治者对外国“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互市二百年，……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⑮；而对以闭关自守为特征的对外关系本身已不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尤为有害这些更关键的问题，他没有提出意见，只是主张继续维持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利于获得西方船炮与白银流入。冯桂芬的看法与魏源基本相同。显然，他们反对的主要是闭关自守状态下的不明外情、不吸收外国长技，而不是那种状态下的对外关系本身。他们对闭关自守的批判，还不能说是深入和击中要害的。

反观横井小楠，在 1855 年前后，他经历了从“攘夷”到“开国”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此后他考虑日本的问题，便自觉地与他所观察、理解的世界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在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是一样。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天涯而成比邻，已呈相互交通之势。至今日而主张独立锁国之旧见，乃悖于天理”^⑯。因此，他虽然愤恨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恃武力逼迫日本开放门户，但同时也承认它们要求日本开放也有顺乎“公共之道”的地方，进而十分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本无“华夷彼此之差别，同为人类，则互相交通、通交易之大利乃今日自然之理势”^⑰，因此不能“以日本一国之私而行锁国”，必须“以公共之道经纶天下”^⑱。横井以往的

“攘夷”观念已被主动放弃锁国、与世界各国广泛交往的新思想完全取代。这是与魏、冯明显不同的。

相应地,横井对德川幕府长期奉为“祖法”的锁国政策,也作了在当时可称是深入的批判。在《国是三论》中,他尖锐地指出:“锁国乃二百年之积习,其害尤大,然而人皆不注意锁国之害”。对于锁国之害,横井细加论列。首先,他指出锁国导致日本经济萧条、普遍穷困:在锁国条件下日本金银花费日多而无增加之途,国内人口增多而土地有限,消耗多而产出少,加上骄奢的社会风气,只能导致普遍穷困;此外,锁国还使民间生产的销售渠道受到限制,导致产品壅滞,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影响生产者的利益。其次,他从政治角度指出锁国之害:日本不仅对外锁国,内部各藩也互相闭锁,谋利己而不惜损人,利政聚敛无所不至;发生财政困难时就削减武士俸禄,榨取豪农富商,汲细民膏血,使士、农、商“交互困穷”,终至民心叛离,多处爆发一揆和向上诉穷事件甚至骚乱;即使官府不向下榨取,厉行节约以图解决财政困难,也会造成“省有益”的问题,且“不遑救士民之急”;总之,继续锁国,只会加剧社会矛盾。第三,从对外关系角度,他指出锁国对日本国家安全有害:在航海自由,万国犹如毗邻的状况下,唯独日本固守锁国之法,则外寇之兵衅不可免;一旦外敌入侵,要在无事尚且极困的国势下严兵备,驱使叛离或怀二心的士民建防御之策,奏攘夷之功,是根本不可能的^⑤。第四,他通过批判当时清朝的闭关自守,指出锁国不利于取外国之长而导致落后挨打:“上自朝廷下迄庶民,有夸大骄傲之风习,虽准海外各国前来贸易,然无意往而考求事物,又不知取长于人,开智识之事。是乃支那兵力衰弱,受各洲凌辱之所以也”^⑥。应该说,横井对闭关锁国的批判,不仅比魏、冯更为全面,而且更有深度、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我国的魏源研究者,尤其是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的研究者,几乎都注意到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对日本幕末时期包括横井小楠在内的志士先觉的启迪与影响。这种启迪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了解和认识世界方面。但是,从本稿中不难看出,原本作为“学生”的横井小楠,与无愧为“先生”的魏源及其后继者冯桂芬,就对外观所体现的适应时代的程度而言,却是前者居上,与后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魏、冯关于世界的认识,尤其是有关本国国际地位、本国对外关系的观念,尚未彻底突破传统观念的窠臼,他们的华夷意识依然强烈,虽反对不关心外情、不学习别国长技,但还没有形成开放型的对外观。而横井小楠却比魏、冯更真切地领悟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及其深刻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华夷观念、锁国意识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清算,系统地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开放特色的对外观。他的“有纵论万国之能力,始可治日本”、“乘天地之气运,顺应万国之状况,以公共之道经纶天下”的思想,当时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是相当卓越的识见。

注 释:

- ① 参见萧致治《评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中日的影晌》,载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403页。
- ② 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湾精华印书馆1964年版。
- ③⑥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光绪十八年敏德堂版下卷,第67 71 70 74 69 73页。
- ④⑧⑨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山崎正董编:《横井小楠遗稿》,日本日新书院1942年版,第41 45 32 39 40 909 905 95 135 290 40-41 207 907 906 32 30-33 42页。
- ⑤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 208 167 207 26 207页。
- ⑦ 参见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页。
- ⑬⑯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增补本,卷37《大西洋欧洲各国总叙》、卷2《筹海篇三·议战》。

(责任编辑 吴友法)